

乌托邦空间的结构相似性与观念差异

——维兰德《金镜》中“自然之子故事”与陶渊明《桃花源记》比较

熊娟飞

西安外国语大学欧洲学院, 陕西 西安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10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13日

摘 要

在跨文化比较视野下,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与维兰德《金镜》中的《自然之子故事》均建构了以地理隔绝为特征的理想社会。文章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 从空间乌托邦视角切入, 梳理两部作品在地理屏障、社会运转、叙事结构及结尾走向上的异同, 说明二者在空间隔离与外来者视角上的相似性, 体现了乌托邦文学跨文化表达的结构共性; 而在内部社会运作与结局处理上的差异, 则反映出魏晋时期隐逸思想与德意志启蒙运动在理想社会构思及政治现实反思上的不同路径。

关键词

乌托邦, 比较研究, “自然之子故事”, 《桃花源记》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and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of Spatial Utopias

—A Cross-Cultural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tory of the Child of Nature” in *Der goldene Spiegel* and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Juanfei Xiong

School of Europe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Received: August 10, 2026; accepted: October 1, 2026; published: October 13, 2026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 Tao Yuanming's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and the “Story of the Child of Nature” in Christoph Martin Wieland's *Der goldene Spiegel* both construct ideal societies characterized by geographical isolation. Employing the parallel study approach i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two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utopia by comparing their geographical barriers, social organization, narrative structures, and endings. The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both texts share structural similarities in their use of spatial isolation and the perspective of an outsider, reflecting the cross-cultural commonality of utopian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ir differences in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narrative resolution reveal distinct conceptions of the ideal society, corresponding respectively to the reclusive ideals of the Wei-Jin period in China and the critical reflection on political reality during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Keywords

Utopia, Comparative Study, "Story of the Child of Nature", *The Peach Blossom Spring*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乌托邦作为一种文学与思想传统，在不同文明语境中呈现出多样化形态。其核心特征在于通过构建一个与现实隔绝的理想社会，对现实世界进行反思与对照。这一点也可以从其概念定义中体现出来：

“乌托邦，无论它是在诸如哲学一类的理论话语中表现出来，这些理论话语把值得追求的另一种社会作为应然状态(Soll-Zustand)与现实社会相对照，还是它在文学文本中表现出来，这些文学文本将一种值得追求的其他方案作为一个虚构社会的实然状态(Ist-Zustand)呈现出来，总之它首先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在彼此迥异的各类话语和体裁当中得到实现，并完全能够承担彼此迥异的各种功能。”([1]: p. 88)

同时，当其作为文学体裁时也有其定义：乌托邦是虚构的文学作品，描绘了一个非真实的人类社会；作者更倾向于这个虚构的社会，而非他所经历的真实社会。……通常，乌托邦作家会假设他们所想象的社会是真实存在的。他们通常会安排访客体验这个社会，然后再进行描述([2]: p. 37)。根据上述定义，中国东晋时期诗人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德国十八世纪启蒙时期作家维兰德作品《金镜》中嵌套的《自然之子故事》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乌托邦作品。

《桃花源记》描述的是一位渔人偶然进入被一个群山环绕的隐秘村落，发现其中存在远离战乱、生活祥和有序的美好社会。然而当他离开后返回再次寻找时，却再也找不到进入桃花源的通道。但桃花源中美好祥和的生活景象却是人们不断追求的理想境地，因此桃花源成为中国文学传统中理想社会的经典象征。

《自然之子故事》同样讲述了一位外来者埃米尔巧合之下进入一个山谷之中，发现了一个与其理念全然不同的理想世界，在这里，居民遵循自然法则井然有序地生活着，展示一种与现实政治形成对照的社会形态。与《桃花源记》类似，《自然之子》也以封闭空间构建理想秩序，但其背后承载的思想却是指向启蒙时代的政治理性与制度反思。

比较文学美国学派不同于法国学派注重考查各种文学现象的实证关系，而是强调没有明确的渊源关系的文学、文化现象之间的研究([3]: p. 202)。美国学派所倡导的平行研究主要关注不同文化体系中的文学现象在不存在直接影响关系的前提下所呈现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通过比较其主题、题材、情节、人物等，探究文学发展的共同规律及其文化内涵([3]: pp. 206-208)。而《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分

别产生于中国东晋时期与德国启蒙运动时期，因此本文采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中的主题文类比较方法进行考察。本文将以“空间乌托邦”为切入点，通过比较两部作品在空间建构、叙事模式、结尾比较及思想内涵等方面的异同，探讨其作为空间乌托邦文类所呈现出的结构相似性以及相似结构背后的文化差异。

2. 空间乌托邦建构

在乌托邦之中，根据作者在建构时选择的框架，又可分为时间乌托邦和空间乌托邦。欣里希·胡德(Hinrich Hudde)在其专著中从四个维度对乌托邦作者在建构乌托邦时对时间或空间框架的选择进行了梳理，其中指出了有关空间乌托邦的几个特质：一是空间乌托邦通常规模较小且与其非乌托邦的外部环境相互隔绝；二是空间乌托邦多被描写为当下存在却遥远的世界，在地理条件上可以轻松设定为土地肥沃、气候宜人的地区；三是空间乌托邦是在别处已实现、已然存在的理想，时间上即时，空间上无约束；四是空间乌托邦会依托纪实游记的形式，轻松、可信地主张真实性([2]: pp. 45-49)。此外，米歇尔·蒂茨曼(Michael Titzmann)在其专著中谈及空间型乌托邦时也说过“这种另类社会位于遥远的异域空间，最好位于一座孤岛上……或者，根据自然哲学思想，位于其他天体上……甚至最终位于地球内部。”([4]: p. 119)由此可见，空间乌托邦的核心特征在于通过与现实世界相隔离的独立空间来承载已经实现的理想社会。而《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与《自然之子故事》中的自然山谷均位于现实世界之外的封闭空间之中，并以外来者的偶然进入作为叙事开端，使理想社会得以被发现和展示。因此，二者不仅具有相似的空间结构，更符合空间乌托邦文类的基本特征。下文将从空间边界的建构以及开放程度两个方面，进一步分析两部作品如何完成空间乌托邦的建构。

2.1. 被“山”隔绝的地理空间

如前文所述，空间乌托邦往往被安置在远离现实社会的独立空间之中，其理想性正是建立在与现实秩序的距离之上。因此，空间边界的建构成为空间乌托邦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中，作者均借助“山”这一自然地理屏障，将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相分离。

在《桃花源记》中，渔人“缘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渔人甚异之。复前行，欲穷其林。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5]: p. 144)随后便进入了桃花源之中。其空间构建依赖于一系列自然地理过渡：小溪、桃花林、山洞。有学者指出，桃花源描述出一个结构清晰的壶天模式空间结构，这个空间构成“一个高度理想化的山间盆地景观模式：一条长长的溪谷走廊，一个仅容一人蛇行的豁口和一个豁然开朗的洞天。”([6]: p. 124)尤其是“山洞”这一意象，既是物理通道，也是空间转换的界限，正是通过了这个狭窄的山洞，使渔人看到了与山洞外完全不一致的景象，山外是没有人烟的桃花林，而山洞之中却是“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5]: p. 144)一派农家和睦，其乐融融的景象。可见桃花源并不显现于现实世界之中，而是隐藏于山洞背后。渔人必须穿越溪流、山洞等过渡空间，才能抵达理想世界，这表明桃花源并非现实世界的自然延伸，而是与现实秩序相区隔的异质空间。“山”在此处不仅是自然景观，更是隔离现实与理想世界的边界。正是由于这一地理屏障的存在，山洞之内美好的桃源世界才能与外在的现实世界分隔，从而使桃源世界得以保持其内部秩序的纯净与稳定。

与《桃花源记》相似，《金镜》中的《自然之子故事》同样将理想世界设定在远离现实社会的群山所在之处，被山谷环绕，借助群山构建起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天然屏障。

在《金镜》的《自然之子故事》中，主人公埃米尔出身富贵，但在返乡途中的山地上遭遇强盗抢劫，在陷入困境后他艰难寻找出路，随后他看到了处于山林之中的一片房屋，于是前往房屋所在之处寻求帮助，从而进入文中所塑造的一个美好世界，即自然山谷所在之处。原文中描写道，在“太阳西斜时，他历

经艰难，终于走到了下山的路口。眼前出现一片山谷，景色之美，哪怕穷尽他所有的想象力也构想不出。翠绿的山林间散落着几栋结构精巧的房子，格外引人注目。看到这番景象，他重新打起精神，拼尽最后的力气，只想赶在日落前走到那些房子那儿。” ([7]: pp. 50-51)可以看出，在对于理想世界的描述上，无论是《桃花源记》中平坦的土地、整齐的房屋、美好的池塘，还是《自然之子故事》中引人注目的、结构精巧的房屋。作者们在描述自己心中的乌托邦世界时都会选用美好的、令人心生向往的词汇，以区分其与现实世界。同时，这一描写不仅展现了山谷优美宜人的自然景观，也表明理想世界并非直接呈现在现实空间之中，而是存在于由山作为自然屏障的山谷之中，周遭被山环绕，虽看似可以轻易抵达，但对于外来的造访者而言都具备一定的困难。同时，群山既是自然景观，也是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天然边界，它将山谷社会与外部社会隔离开来，使这一社会能够远离现实世界的纷争与干扰，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维持其自身的社会秩序。因此，山谷不仅是故事发生的背景，更承担着建构乌托邦空间的重要功能，它保证了理想社会的独立性，也使山谷社会获得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空间属性。

在这两篇故事中，作者都以“山”这个自然元素作为阻挡或是说隔绝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屏障，从“山”的物理结构出发，对外来的造访者提出一定程度的挑战，在《桃花源记》中以狭窄的山洞入口试图阻挡外来者，而在《自然之子故事》中则是通过群山环绕的山谷形成天然屏障，使理想世界在地理上呈现出隐蔽而难以抵达的特征，这两段路的形态虽然全然不同，但都是山作为自然屏障对于造访者的考验。这种通过自然屏障隔绝现实社会的空间设置，使乌托邦世界得以维持其内部秩序的纯净性与稳定性。山体不仅是地理障碍，更承担着划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边界功能。虽然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文化语境，但均借助山这一自然地理屏障完成理想空间与现实世界的区隔。山体不仅具有地理意义，更承担着空间边界的功能，使乌托邦社会获得独立、自足的发展环境。这种通过独立空间承载理想社会的建构方式，正体现了空间乌托邦文类的重要特征。

2.2. 乌托邦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交互形式

“由于洞有两口，说明此山洞可以作通道，由这个通道就可以从尘世间走到理想社会的桃花源了——这个社会不与尘世社会相混(高山隔断之)，但却相通。” ([8]: p. 9)虽然在地理结构的设置上，两个文本中的乌托邦世界都与外界存在隔绝的界限，但在内部社会的运转层面上，二者却存在不同。

在《桃花源记》中，渔人在刚进入桃花源时见到其中“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 ([5]: p. 144)的一派景象，反映出在桃花源之中，人们可以通过农耕生产以实现自给自足，不必依赖外界的物质也可以维持在桃花源内的生活。而桃花源中的居民在自述时又提到“白云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 ([5]: p. 144)这说明桃花源居民自从进入桃花源后便主动切断了与外部的现实世界的联系。随后文中又提到“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此人一一为具言所闻，皆叹惋。” ([5]: p. 144)由此进一步可见，桃源内的居民对于时事的了解存在闭塞情况，即其自从进入桃源之后就不问世事，或者说是由于桃源与外界隔绝之后居民再没有可以了解外部世界的渠道，但联系前文可知，这并不影响其社会的正常运作。由此可见，无论是在物质生产、人员往来还是信息交流层面，桃花源都保持着与现实世界的高度隔离，其内部社会能够依靠自身维持稳定运转，形成一个几乎完全独立于现实社会之外的封闭共同体。

《自然之子故事》中的社会虽然同样是通过山体隔绝形成独立空间以承载理想社会，但其与现实世界之间依然存在一些联系。老者在向埃米尔介绍自然山谷之中的生活方式时直接说道：“我们依靠自己的产物提供衣食；至于所缺的少许物资，则用我们富余的物产去向邻近的贝都因人交换。” ([7]: p. 79)由此可见，自然山谷之中的生活不同于桃源之中的生活，还不能够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仍需借助与现实世界的物资交换才能维持整个社会的生活运转需求，因此，其在经济体系上并非完全封闭，而是保持着一

定的对外联系。与此同时，在人员流转方面其也存在内部和外部的交互。老者还提到“凡是展现出超凡才能、不安分的心性、功名心的苗头，哪怕只是单纯渴望见识外在世界的人，都要将他们从我们中间遣走。”([7]:p.80)也就是说，山谷并不会强行将所有居民留在其中，而是允许一部分居民离开山谷，在现实世界之中施展自己的才华。老者还说道：“我们这里也有男女奴隶，但养着他们多半是为了充当陪伴与消遣，倒并非想从他们身上榨取什么实用价值。我们是在他们童年时，从贝都因人那里买下他们的。”([7]:p.82)可见，山谷内外的关联也不仅限于山谷内的人员向外流动，同样存在着外部人员进入山谷生活的情况，由此形成了双向的人员交流因此，山谷中虽然保持着相对独立的社会秩序，但却并未完全切断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联系，而是在经济及人员流动方面保持着一定的互动。

综上，两个乌托邦故事虽然在空间建构的具体形态上存在一定差异，但二者都通过独立空间承载理想社会，并借助地理环境形成区别于现实世界的乌托邦空间，因此均可归入空间乌托邦文类。然而，在乌托邦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处理上，两部作品呈现出不同倾向。《桃花源记》通过经济自给自足、人员封闭以及信息隔绝，构建起一个几乎完全脱离现实世界的封闭型乌托邦；《自然之子故事》则在保持独立空间的同时，仍保留物资交换和人口流动等多种互动方式，使理想社会始终与现实世界保持有限联系。二者均以独立空间承载理想社会，却分别体现了封闭型与开放型两种不同的空间建构模式，也为后文进一步比较两部作品的叙事结构与思想内涵奠定了基础。

3. “外来者”叙事模式及其乌托邦功能

3.1. “进入 - 观察 - 离开”的叙事结构

《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不仅在空间建构上具有相似性，在叙事结构上也呈现出较高的可比性。二者均采用了“现实世界 - 理想世界 - 重返现实世界”的叙事模式，即主人公由现实世界出发，因偶然机缘进入乌托邦世界，在短暂停留并完成对理想社会的观察后，再重新回到现实世界。这种叙事框架使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始终保持着清晰的界限，同时也使乌托邦世界在与现实社会的不断对照中凸显其理想性。然而，由于两部作品的创作背景、文本性质及创作目的不同，其乌托邦叙事在整体文本结构和文学功能上又呈现出不同特点。

在整体叙事框架上，两部作品均遵循了由现实进入理想、再由理想回归现实的基本叙事路径。《桃花源记》中，渔人沿溪而行，误入桃花源，在其中停留数日后离开，并最终回到现实世界；《自然之子故事》中，埃米尔在返乡途中遭遇变故，于山林中迷失方向，在偶然发现自然山谷后进入这一理想世界，并在受到热情款待、了解其中的生活方式后重新回归现实世界。尽管两部作品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但二者都未将乌托邦世界塑造成一个与现实世界完全割裂的存在，而是借助主人公“进入 - 停留 - 离开”的经历，将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联系起来。在这一“进入 - 观察 - 离开”的叙事过程中，外来者既连接了现实世界与乌托邦空间，也使理想社会得以通过观察、比较和叙述逐步呈现。在现实与理想的不断对照中，乌托邦社会的秩序、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得以展现，其作为理想社会的特征也因此更加鲜明。

3.2. “外来者”视角与乌托邦的认知陌生化

除了“进入 - 观察 - 离开”的叙事路径之外，两部作品还共同设置了一位来自现实世界的“外来者”作为乌托邦空间的观察者和叙述者，并借助其视角完成对乌托邦世界的展示。《桃花源记》中，无论是发现桃花林、进入山洞，还是桃源社会的风俗民情，都始终围绕渔人的所见所闻展开，读者对于桃花源的认识也受其观察视角的引导。渔人在此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情节中心人物，而主要承担发现桃源、进入桃源并将其见闻带回现实世界的叙事功能。同样，《自然之子故事》中的埃米尔也并非山谷社会的成员，而是在机缘巧合下进入这一理想世界。从山谷的自然环境、居民生活，到老者对于制度和社会运行方式

的讲述，读者对于山谷社会的全部认识均建立在埃米尔的所见、所闻与所感之上。由此可见，两部作品中的外来者都承担着连接现实世界与乌托邦空间的作用。乌托邦世界并非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而是在外来者“发现－观察－理解”的过程中逐步展开，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也因此形成更加鲜明的对照关系。同时，由于外来者始终不属于乌托邦社会，其进入本身便意味着一种短暂的停留，这也为其最终返回现实世界埋下伏笔，使乌托邦始终保持着与现实世界既相连又相异的叙事张力。

从乌托邦文学的功能来看，“外来者”的设置使两部作品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认知机制。渔人与埃米尔原本都属于乌托邦之外的现实世界，他们进入陌生空间之后，对于自然环境、社会秩序以及生活方式的认识，实际上始终建立在自身既有经验与眼前陌生社会之间的比较之上。正是由于二人并不属于乌托邦内部，他们对于这一空间的惊异、观察和理解，也使读者能够随着外来者的视角重新审视原本习以为常的现实秩序。

对于渔人而言，桃花源居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5]:p.144)”的生活状态，与外部世界不断变化的历史现实形成鲜明对照；而埃米尔进入自然山谷之后，山谷居民不同于其原有生活经验的社会组织与生活方式，也不断冲击着他对于现实社会的既有认识。因此，这种陌生空间的建构并不只是为了展示一个与现实不同的理想世界，更通过外来者的观察与比较，使现实世界本身成为可以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对象。换言之，乌托邦在这里所形成的并不仅是空间上的距离，也是一种认知上的距离：正是因为存在一个不同于现实的社会，现实社会中原本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和秩序才得以重新进入观察与思考的范围。

因此，尽管《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最终赋予乌托邦不同的思想内涵，但二者均借助“外来者”进入陌生空间的叙事方式，在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建立起认知上的对照。外来者既是乌托邦的发现者，也是现实经验的携带者。正是在二者的相互比较之中，乌托邦不仅作为理想社会得以呈现，也使现实世界获得了被重新认识的可能。

3.3. 文类属性与乌托邦的不同功能

尽管《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均通过外来者进入陌生空间的方式建构乌托邦，并借助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之间的对照形成一定的认知距离，但这种相似的叙事机制在两部作品中所承担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二者所处的整体文本结构及其文类属性存在明显差异。《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叙事本身构成作品的主体，而《自然之子故事》则作为嵌套故事存在于《金镜》的整体叙事框架之中。乌托邦在文本中的不同位置，使其不仅具有不同的叙事作用，也分别承担了不同的思想功能。

《桃花源记》的叙事整体围绕渔人发现、进入、离开以及再次寻找桃花源的过程展开。正如有学者指出，《桃花源记》的文本在整体上符合当时志怪记体的基本框架，交代了“实在的”时间和地点，“异境”的发现和隐没也都具有扑朔迷离的神秘色彩（“忽逢桃花林”、“甚异之”、“处处志之”却“不复得路”等）([9]:p.162)。在这一叙事结构中，桃花源并不是为了说明某一外部观点而存在，而是整个作品叙述的中心。渔人的进入使这一理想空间得以呈现，而其最终无法再次进入，则使桃花源由一个曾经被发现的现实空间转变为不可复现的理想世界。因此，桃花源的意义主要通过其自身的呈现与隐没得以完成，乌托邦本身既是作品的叙事对象，也是其最终建构的精神空间。

而《自然之子故事》虽然具有同样的叙事结构，但它并不是一部独立存在的乌托邦小说，而是作为《金镜》中的嵌套故事而存在。因此，对自然山谷乌托邦的理解不能脱离《金镜》的整体文类属性及其写作功能。邓深指出，《金镜》作为维兰德重要的政治性小说，大量涉及君主教育的主题，并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君主镜鉴的体裁传统([10]:p.143)。因此，《自然之子故事》便不仅仅是对一种理想社会的独立

叙述，而具有更为明确的功能性。自然山谷的故事由达尼什曼德向君主讲述，其所展示的社会组织、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也因此被置入君主教育与政治思辨的语境之中。从这一角度来看，《自然之子故事》中的乌托邦并非随着故事叙述的结束而完成其全部意义，而是如文本所呈现的那样，埃米尔离开自然山谷之后，围绕山谷社会及其制度安排的讨论仍然在达尼什曼德与君主之间继续展开。这意味着，自然山谷不仅是一个被展示的理想空间，同时也是一个可供讨论、比较和检验的思想对象。正是《金镜》的君主镜鉴属性，使嵌套其中的乌托邦叙事具有了不同于《桃花源记》的功能：它并非单纯通过理想社会与现实形成对照，而是进一步将这一理想社会作为思考现实政治与社会制度的参照。

由此可见，两部作品虽然都通过外来者的进入完成了乌托邦空间的展示，但乌托邦在各自文本中的功能却有所不同。《桃花源记》中，渔人的发现使桃花源得以呈现，而桃花源最终的隐没则使这一理想世界始终保持在与现实相隔绝的状态之中。乌托邦的意义主要在于其作为理想空间本身被呈现和保存。不同的是，《自然之子故事》中的自然山谷虽然同样作为一个区别于现实社会的理想空间出现，但其意义并不止于展示一种理想生活方式。由于这一故事被嵌入《金镜》的君主教育与政治思辨框架之中，自然山谷还进一步成为观察、讨论和反思现实社会的思想实验。换言之，桃花源的价值更多地体现为对理想的呈现与保存，而自然山谷的价值则进一步体现为通过对理想社会的建构，引发对于现实社会的比较与思考。

4. 故事结尾的不同走向

前文已论述，两部作品都采用了由现实世界进入乌托邦、最终返回现实世界的叙事模式。然而，当故事发展至结尾时，两部作品对于乌托邦最终命运的处理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倾向。《桃花源记》最终关闭了现实世界重新进入桃花源的可能，而《自然之子故事》则始终保留了乌托邦继续存在并与现实世界保持联系的开放空间。

4.1. 故事结尾是否呈开放性

《桃花源记》中，渔人在离开桃花源之前，虽然答应桃源居民“不足为外人道也”，却仍在返回途中“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处处志之”([5]: p. 144)，并将桃花源中的见闻禀告太守，希望再次寻得这一理想世界。然而，无论是太守派人寻访，还是后来南阳刘子骥继续探寻，都最终“遂迷，不复得路”([5]: p. 144)，自此“后遂无问津者”([5]: p. 144)。随着现实世界重新进入桃花源的通道被彻底关闭，桃花源也由最初一个真实可抵达的空间，转变为一个不可复现、不可到达的理想世界。这种结局不仅呼应了前文中桃花源与现实世界始终保持边界的空间建构，也进一步强化了桃花源超越现实的乌托邦属性。正如有学者所言：“其实，谁也不会想到拥有它，但谁也不愿失去它，它永远是人们跋涉红尘的一种精神需要，永远给人们以有处可逃、有处可避的安慰，并给人们希望永存的信念而有恃无恐、义无反顾地向前。”([11]: p. 220)也正因为桃花源最终无法再次进入，它才摆脱了现实经验的限制，由现实中的理想社会升华为一种永恒存在于精神世界中的乌托邦意象。

相比之下，《自然之子故事》的结尾并未彻底切断现实世界与自然山谷之间的联系。依据达尼什曼德所引据的原始文本，故事首先停留在埃米尔目睹老者一家共享天伦之乐的场景。面对这一温馨祥和的家庭图景，埃米尔既感受到理想生活所带来的精神震撼，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自身现实生活与自然山谷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如果故事至此结束，那么相较于《桃花源记》彻底关闭桃源入口的处理方式，《自然之子故事》并未说明自然山谷是否会就此消失，也没有否定现实世界再次进入这一空间的可能，因此自然山谷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性的存在状态。即便将达尼什曼德后续关于埃米尔命运的讲述视作整个《自然之子故事》的真正结尾，其开放性依然没有发生改变。关于埃米尔的最终归宿，故事同时保留了两种

不同说法：一种认为他因无法承受现实生活与自然山谷之间的巨大反差而选择跳崖自尽；另一种则认为埃米尔与这些自然的子民们告别后便加入了苦行僧的团队，随后以沙克·库班之名成为最伟大的道德教师而驰名也门。两种不同版本的并存，使故事并未形成唯一且封闭的结局，而是为读者保留了更多理解与想象的空间。同时，《自然之子故事》结束之后，达尼什曼德与君主围绕自然山谷中社会制度的讨论仍在继续，这说明自然山谷并未随着故事的结束而失去意义，而是继续作为政治思辨的重要对象，与现实世界保持着持续的联系。

由此可见，两部作品虽然都以主人公离开乌托邦作为故事结尾，但对于乌托邦最终命运的处理却呈现出不同倾向。《桃花源记》通过关闭现实世界重新进入桃花源的可能，使桃花源最终成为一个不可复现、不可抵达的精神空间；《自然之子故事》则始终保留着自然山谷继续存在以及现实世界再次与之发生联系的可能，使乌托邦并未随着故事结束而终结，而是继续参与现实世界的道德与政治思考。两种不同的结局安排，不仅体现了两部作品对于乌托邦存在方式的不同理解，也为后文进一步分析二者思想内涵的差异奠定了基础。

4.2. 外来者行为与最终归宿

在两部作品中，渔人与埃米尔均作为来自现实世界的外来者进入乌托邦空间。然而，两人在离开乌托邦之后的行为及其最终归宿却呈现出明显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影响了乌托邦空间的最终呈现方式，也进一步反映出两部作品对于理想社会与现实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

在《桃花源记》中，渔人虽然离开了桃花源，却始终试图重新寻找这一空间。从《桃花源记》的整体叙事来看，有研究指出，渔人虽然贯穿故事始终，却并不以传统意义上的主人公身份出现。作品的叙述重点并不在于塑造其丰满的性格，而在于通过其“发现桃源—传达见闻—寻而不得”的经历完成桃花源的呈现及其最终的神秘化。因此，渔人在文本中主要承担发现、传达和连接现实世界与桃花源的功能性作用([9]: p. 157)。从这一角度来看，渔人离开桃花源之后的行为以及最终“寻而不得”的结果，并不仅仅构成其个人经历，也共同推动了桃花源由偶然可进入的空间转变为不可复现的理想空间。此外，桃源居民在渔人离开之前曾叮嘱其“不足为外人道也”([5]: p. 144)，然而渔人离开之后却“处处志之”([5]: p. 144)，并在郡下“诣太守，说如此”([5]: p. 144)。对于这一行为，也有研究从人物性格的角度进行了评价，认为渔人违背了桃源中人的嘱托，甚至将这一行为理解为对桃花源的“出卖”([12]: p. 56)。这一观点强调了渔人与桃源社会之间存在的冲突。结合前文关于渔人叙事功能的分析可以看到，无论如何理解其具体行为动机，渔人的行为最终都推动了桃花源重新进入现实世界的寻找范围。此后，太守派人随渔人寻找桃花源，刘子骥闻讯后也前往探寻，但最终皆未能成功。渔人从偶然发现桃源，到传述桃源，再到最终无法重新进入桃源的经历，共同完成了桃花源由现实中曾经存在的具体空间向不可抵达的理想空间的转化。

而《自然之子故事》中，埃米尔在自然山谷中生活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现实世界，但他并未重新回归此前的生活状态。离开自然山谷后，埃米尔的生活经历发生了一系列变化，最终甚至由此前的纵欲走向禁欲的另一极端。对于埃米尔离开自然山谷之后的这一变化，邓深认为，其极端转变表明自然山谷的教化并未真正取得成功，也体现出维兰德对于理想社会现实有效性的反思([1]: p. 90)。这一观点主要从自然山谷的教化效果出发，揭示了理想社会对于现实个体进行塑造时所面临的局限。本文进一步认为，埃米尔最终没有重新回到自然山谷同样值得关注。虽然他曾在山谷中接受当地社会生活方式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并未使其真正成为乌托邦世界的一员。在其最终仍然回到现实世界，并在现实生活中经历新的变化，这表明乌托邦对于外来者的影响并不能简单地延续到其离开之后的现实生活之中。

综上，渔人与埃米尔虽然都曾作为外来者进入乌托邦，但二人在离开之后的经历却体现出两种不同

的乌托邦与现实关系。渔人在离开桃花源之后试图重新寻找这一空间，却最终“不复得路”，其个人经历进一步强化了桃花源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距离；埃米尔则在离开自然山谷之后重新进入现实社会，其后续经历表明乌托邦虽然能够对现实个体产生影响，却无法保证这种影响在离开乌托邦之后持续发挥作用。两位外来者不同的最终归宿，进一步体现了桃花源与自然山谷两种空间乌托邦在现实世界中的不同存在方式。

5. 相似结构之下的思想分化

尽管两部作品同属空间乌托邦，但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并不在于文本形式，而在于作者赋予乌托邦的不同思想内涵。陶渊明借桃花源寄托精神理想，维兰德则借自然山谷展开现实政治的思考，这也构成了两部作品乌托邦观念的本质差异。

陶渊明早年深受儒家入世思想的影响，在官场沉浮八年。八年间，陶渊明置身于东晋政治风云的漩涡之中，始终出淤泥而不染，并最终避世归隐([12]: p. 57)。《桃花源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借助桃花源这一理想世界寄托了作者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作品以大量笔墨描绘了桃源之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共生的生活图景。与桃源内部所呈现的淳朴、信任与和谐相比，来自现实世界的渔人则构成了另一种价值逻辑的体现。正如前文所述，渔人在发现桃花源后将其传述于外，并最终再也无法重新进入这一空间。从思想层面来看，这一叙事结果并不只是意味着桃花源在空间上的隐没，更体现了理想世界与现实社会之间难以消除的距离。渔人作为现实世界的来访者，其行为仍然遵循现实社会的认知与行动方式，其中也隐含着难以摆脱的功利意识与人性局限，而这种现实价值逻辑恰恰与桃花源所代表的淳朴、信任与和谐形成鲜明对照。因此，当现实中的人试图再次进入桃花源时寻不到路径，并非只是空间上的隐没，更象征着理想世界对于现实社会价值逻辑的拒绝。陶渊明借此表明，桃花源之所以能够保持其纯粹与美好，正是因为它必须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一旦现实中的功利、人性的缺陷进入其中，乌托邦便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桃花源记》中的乌托邦并非现实社会可以真正实现的蓝图，而是一种寄托理想人格、反思现实人生的精神归宿。

而维兰德创作《金镜》的目的并不在于构建一个远离现实的理想世界，而是借助乌托邦文学这一形式展开对于现实政治的思考。尽管目前并没有直接材料能够证明《金镜》与维兰德希望进入维也纳宫廷之间存在直接联系，但其具有明显的政治劝谏意味([13]: p. 19)。《自然之子故事》在文本内部是达尼什曼德向苏丹讲述的寓言故事，在文本之外则寄托着维兰德对青年约瑟夫二世的政治期待。由此，自然山谷的意义并不止于呈现一种宁静和谐的自然生活，更在于通过这一与现实隔离的空间，对现实社会中的制度与秩序进行观察和思考。维兰德借助一个相对封闭的乌托邦空间，对现实世界中尚未实现的政治制度进行推演与尝试，希望借此探索一种更加合理的社会秩序，并为现实政治提供可供借鉴的思想资源。从这一意义上说，《自然之子故事》中的乌托邦并非最终目的，而是一种面向现实社会的思想实验。正因如此，维兰德在作品结尾并未让自然山谷成为一个可以永久停留的理想归宿，而是借助埃米尔最终离开山谷以及故事后续对制度的持续讨论，进一步引导读者思考：乌托邦真正的价值，并不在于逃离现实，而在于反思现实，并探索现实社会改革的可能。

由此可见，虽然《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都借助空间乌托邦建构了一个区别于现实世界的理想社会，但两位作者对于乌托邦功能的理解却存在根本差异。陶渊明借助桃花源寄托对于理想人格和美好社会的向往，使乌托邦成为现实之外永恒存在的精神家园；而维兰德则借助自然山谷展开对现实政治的制度推演，使乌托邦成为检验现实社会可能性的思想实验。前者着眼于保存理想，后者则试图反思并改造现实。这种思想取向的不同，不仅决定了两部作品在人物命运、结局安排上的差异，也进一步体现了两部作品在各自文化语境下不同的价值取向与思想诉求。

6. 结语

在《桃花源记》与《自然之子故事》中，理想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界限虽然同样借助山地空间得以建立，二者所塑造的乌托邦形态也存在一定的相似与差异，但其最终承载的思想意义却有所不同。《桃花源记》中的桃花源是对现实动荡社会的超越，是对平静祥和生活的精神寄托；而《自然之子故事》中的自然山谷则是对现实政治秩序的反思，是对理想社会制度的探索。两部作品在叙事模式和空间建构上的相似，说明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文学创作仍具有某些共通的表达方式；而二者在结局走向与思想功能上的差异，则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乌托邦观念的差别。正是在这种相似与差异的交织之中，两部作品跨越文化与时代的文学价值与思想意义得以呈现。

参考文献

- [1] 邓深. 指涉现实、反思自身、诉诸道德——从维兰德小说《金镜》中的《自然之子故事》看 18 世纪下半叶的德语启蒙乌托邦文学[J]. 国外文学, 2020(3): 86-96+158-159.
- [2] Hudde, H. (2024) Utopie-eine literarische Gattung. FAU University Press.
- [3] 杨乃乔, 主编. 比较文学概论[M]. 第 4 版.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 [4] Titzmann, M. (2012) Anthropologie der Goethezeit: Studien zur Literatur und Wissensgeschichte. Walter de Gruyter GmbH & Co KG.
- [5] 陶渊明. 陶渊明全集[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 [6] 孔翎. 明清桃源主题图像的空间建构[J]. 艺术百家, 2023, 39(6): 123-128.
- [7] Wieland, C.M. (1839) Der goldne Spiegel oder die Könige von Scheschian. Eine wahre Geschichte aus dem Scheschianischen übersetzt. Bd. 1. Georg Joachim Göschen.
- [8] 付开镜. 《桃花源记》“山洞式”空间思维的构建[J]. 名作欣赏, 2011(35): 8-9.
- [9] 周皓, 李英垣. 渔人、桃源与记——比较研究视阈下的《桃花源记》[J]. 中国比较文学, 2018(4): 155-163.
- [10] 邓深. “君主镜鉴”还是“修养小说”?——从体裁史角度看维兰德小说《金镜》对《赵氏孤儿》的接受[J]. 外国文学, 2016(1): 140-149.
- [11] 孙晓梅. 陶渊明诗歌典型意义的文化解读[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4.
- [12] 黄志福. 且说作为小说的《桃花源记》——“武陵人”形象与意义探究[J]. 中学语文教学, 2020(5): 55-57.
- [13] (德)克里斯托弗·马丁·维兰德. 金镜: 西羌国列王纪[M]. 蒋佳,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2.